

新華書店與解放區文學 出版體制的形成

• 郭國昌

1942年5月，當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解放區文學開始進入了規範化的發展歷程，並且最終形成了影響1949年後中國文學走向「一體化」的文學生產制度。作為解放區文學生產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解放區文學的出版體制是以1937年4月於延安成立的新華書店為中心建立起來的。新華書店的建立不僅從文學生產制度層面規範了解放區文學的出版體制，而且也從意識形態傳播層面統一了解放區文學的政策觀念。

解放區文學的出版體制是以延安新華書店為中心建立起來的。新華書店的建立不僅從文學生產制度層面規範了解放區文學的出版體制，而且也從意識形態傳播層面統一了解放區文學的政策觀念。

一 文學出版的社團化

由於戰爭的環境和意識形態的對立，解放區文學經歷了從「自由」到「規範」的演化過程，其結果是解放區文學建立了一套統一的文學生產制度。其基本內容之一——解放區文學的出版體制是在1942年以後逐漸形成的。以前，那裏的文學出版體制是相對自由的，完全是一種社團化的出版方式。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前，延安的新文學活動是相當「荒蕪」的。當時的延安沒有一份公開出版的新文學刊物，僅有的一家名叫「光華書局」的出版社雖然也偶爾代售一些新文學書刊，但主要是以出版和翻印古籍書刊為主的。1937年1月，當延安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和軍事中心時，這塊「荒蕪」之地隨即也變成了左翼知識份子的文化中心，成為那些探索革命道路和尋求文學理想的「年輕人的聖城」^①。伴隨着大量知識份子作家的到來，延安的文學活動也迅速地開展了起來。與國統區的政治高壓和思想禁錮完全不同，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則充滿了「自由的空氣，寬大的空氣，快活的空氣」^②。由於政治上的相對民主和思想上的相對自由，一大批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文學社團廣泛地建立了起來，它們成為解放區作家從事文學出版活動的主要陣地。

解放區最早出現的文學社團是1936年11月創辦的中國文藝協會。它是在中共的宣導和支持下建立的，徐特立、陸定一、伍修權、李克農等一些中共的領導人參加了發起活動^③。它的成立拉開了中共參與創建和領導文學社團活動的序

幕，開創了解放區文學社團活動的模式之一，即政黨對文學社團的直接控制。按照丁玲的最初設想，中國文藝協會只是一個「將愛好文藝的同志聚集在一起」定期舉行座談會、討論文藝問題、創作和出版文學作品的「文藝俱樂部」④。也就是說，丁玲本來打算將該協會辦成一個由知識份子作家組成的純粹文學社團。然而，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卻認為協會應當是一個由中共指導的「從文的方面去宣傳教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進行工農大眾的文藝創作」的文學社團⑤。於是，中國文藝協會就不再單純是一個由知識份子作家組成的文學社團了。

當中共迫切需要文學為自己的政治運動提供輔助時，必然會進一步擴大政黨對文學社團的影響力。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後，中共不但參與了解放區一些比較重要的文學社團的組建活動，而且還在文學社團中建立了黨支部，直接對文學社團的活動進行領導。1937年8月成立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就是如此。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丁玲本着「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錢，走很多的地方，寫很多的通訊」的目的⑥，倡議成立一個戰地記者團。然而，由於參加者來自文學、戲劇、音樂、美術界等各個方面，大大超過了丁玲當初的預期，因而西北戰地服務團成立時變成了一個「半軍事化、以宣傳為主」的戲劇團體。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以下簡稱中宣部）長凱豐的建議下，由吳奚如擔任書記、丁玲擔任宣傳幹事、陳克寒擔任組織幹事的黨支部建立了起來。據丁玲所說，服務團雖然「是一個藝術宣傳團體，但對於政治的學習卻應擺在第一位」的⑦。在延安的四十多天準備時間裏，服務團學習小組邀請毛澤東、凱豐、李富春、莫文驊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做了〈大眾化問題〉、〈統一戰線〉、〈戰時的地方群眾工作〉、〈戰時政治工作〉等政治報告，以期全面提高團員的政治素養和理論水準。正是由於這種政黨化的文學社團的組織方式和活動模式，使丁玲也感到「自己不是一個自由的人了」⑧。

然而，政黨對文學社團的控制只是解放區文學社團活動的一種模式。隨著因為知識份子的匯聚而造成的解放區政治環境的更加民主化，解放區出現了第二種文學社團活動模式，即作家對文學社團的控制。1939年5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成立表明了解放區文學社團超越政黨限制而獨立組建的開始。該分會的前身是1938年9月成立的陝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屬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邊區文協）領導。抗戰聯合會是解放區作家「要求着文藝方面有一個總的組織」而成立的⑨，參加成立大會及大會選出的執委有成仿吾、丁玲、周揚、林山、田間、沙汀、任白戈、柯仲平、劉白羽、雪葦等，他們全部都是作家，基本不受中共的干預。為了取得與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文協）的密切聯繫，抗戰聯合會於1939年5月更名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該分會雖然仍是邊區文協的團體會員之一，但同時又接受文協的領導，隸屬關係上的雙重身份使其具有了超越政黨控制的傾向。中共只是「爭取對於各種文化團體機關的影響」⑩，並不直接參與對這類文學社團的領導。

延安分會畢竟是設立在解放區的文學社團，因而難免要按照中共的要求參與解放區的一些抗戰政治宣傳工作，但是它的「獨立進行工作」的性質使其工作重點很快轉向了解放區文學活動的開展⑪。一方面，為了有效推進解放區的文學活動，該分會依照總會的要求很快完善了組織機構；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由知識份子作家主持的文學社團，該分會在解放區全面啟動了「知識份子型」的文學大眾化運動——「文藝小組」、「星期文藝學園」活動。分會要求會員在工廠、部

政黨對文學社團的控制只是解放區文學社團活動的一種模式。隨著因為知識份子的匯聚而造成的解放區政治環境的更加民主化，解放區出現了第二種文學社團活動模式，即作家對文學社團的控制。

隊、學校、機關組織喜歡文學的青年成立文藝小組，不定期邀請解放區的作家進行文學講座，討論文學創作問題。從其成立到1941年8月，分會在解放區建立了85個文藝小組，登記成員668人^⑫。可以說，分會通過開展「獨立」的文學活動擴大了在解放區文學運動中的影響力。

儘管解放區文學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政黨式」和「作家式」兩種不同的文學社團活動模式，但是文學社團活動模式的區別並沒有造成文學出版方式的分化。由於解放區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文學出版機構，因而在解放區文學的出版活動中，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學社團共同承擔着解放區文學的出版任務，發揮着解放區文學的出版功能。同時，更重要的是，由於解放區還沒有建立相應的文學出版規範，因而，解放區文學社團的出版活動是完全自由的。每個文學社團出版的文學報刊和書籍都是由作家組成的編委會獨立負責的，無須經過中共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相關部門的出版審查。

隨着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社團化的文學出版方式在解放區迅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書店化的文學出版方式。新華書店除了發行中共出版的全部書報雜誌外，還發行解放區文學社團出版的全部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

二 新華書店功能的多元化

社團化的文學出版方式帶來了解放區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出版的興盛。在「思想的創作的自由獲得了充分的保障」的前提下^⑬，解放區作家「大膽地創作、寫作、著述、介紹、翻譯」，形成了一種「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辯論的生動、活潑、民主的作風」^⑭。延安的街上貼着街頭詩、文藝壁報、美術壁報，書店裏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文學出版物，那些來自國統區的知識份子作家要麼主持文學社團的活動，要麼從事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的編輯出版，處於一種從來沒有過的自由狀態之中。然而，隨着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社團化的文學出版方式在解放區迅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書店化的文學出版方式。

這一轉化是與新華書店功能的多元化直接相關的。1937年1月，中共中央從保安進駐延安後成立了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專門負責中共書報雜誌的出版和發行工作。同年4月，中央黨報委員會組建了解放社和新華書店兩個專門機構，解放社承擔中共的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和其他書報雜誌的出版任務，而新華書店則承擔中共出版的全部書報雜誌的發行任務，是「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領導下的專業發行機構」^⑮。事實上，新華書店還發行在解放區出版的其他各種各樣的書報雜誌，其中包括解放區文學社團出版的全部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

在新華書店成立的最初幾年裏，它只是發揮着單一的發行功能。隨着中共領導的解放區地域的迅速擴大，新華書店的發行範圍開始成倍增加，1939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建立中央出版發行部，從「中央起至縣委一律設立發行部」，專門「散發、分配和推銷黨的各種出版物」^⑯，而新華書店則從中央出版發行部獨立出來，成為解放區非政黨化的書報刊物發行機構。此後，新華書店便迅速對已有的發行體制和機構設置進行了調整，將延安的新華書店更名為新華書店總店，在延安以外的其他解放區成立新華書店總店的分支機構，建立了覆蓋整個解放區的書報刊物的發行網絡。

發行體制和機構設置的調整首先帶來了新華書店發行觀念的變革。總店提出，各個解放區組建分店時都必須以「極大的注意力來加強發行人員的政治與理

論的水準，使其能把握革命的理論，堅定其政治立場與意志」^①。由此形成了解放區書報刊物發行觀念的政治化。因此，新華書店以自己的發行觀念來衡量解放區文學社團出版的各種文學報刊和文學書籍時，自然存在許多不合規範之處。一旦解放區文學社團的出版活動被納入到新華書店的發行網絡中時，新華書店對其文學報刊和文學書籍的整合就不可避免。與發行觀念的變革相伴隨的是新華書店功能的多元化擴張。新華書店最初是作為中共出版的書報雜誌的專門發行機構而成立的，因而沒有作為一般出版社所應有的出版功能。當新華書店從中央出版發行部獨立出來後，單一的發行功能顯然不符合現代出版機構的功能要求，也無法滿足解放區民眾日益擴大的多樣化書報雜誌需求。為此，新華書店增加了一般出版機構所應有的出版功能，建立了「編輯、出版、發行合一的體制」^②。在恢復編輯、出版功能的基礎上，經過一系列編輯、出版和發行制度的確立，新華書店終於完成了從只具有單一的發行功能向擁有編輯、出版和發行的多元化功能的轉化。

當新華書店正在極力改變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出版格局的同時，文學社團的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出版現狀也開始悄悄地發生着變化。解放區文學社團大多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的二三年間成立的，由這些文學社團編輯的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也是在此期間開始出版的。這是一段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出版相當活躍的時期，然而它們是在相當困難的條件下編輯出版的。文學社團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物質條件的艱苦，諸如缺乏紙張、沒有機器、缺少人力等等，文學報刊的脫期是經常的現象，文學書籍的出版基本是停頓了。但是，文學社團仍然苦苦地堅持着、掙扎着^③。不僅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的出版如此，其他類型的書報雜誌的出版也同樣如此。

面對書報雜誌出版的困境，1941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了〈關於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在優先「保證某些小冊子的急於出版」的前提下，暫停部分刊物的出版，其中就包括文協延安分會出版的《中國文藝》^④。同年7月，中宣部做出了整頓「各抗日根據地報紙雜誌」出版的指示，要求「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地域上有獨立性的區黨委」方可出版一種「政治報紙」、「政治雜誌」、「黨內刊物」、「綜合的文化文藝性質的雜誌」、「作為社會教育工具的通俗報紙」。其中「政治報紙」和「作為社會教育工具的通俗報紙」是必須出版的，而「綜合的文化文藝性質的雜誌」須「在黨指導下，依人力物力來決定，不要勉強湊數」^⑤。也就是說，文學社團是沒有資格出版作為「政黨喉舌」的報紙的，而文學雜誌在「人力物力」都非常緊張的條件下也就失去了繼續出版的合理性。

經過中共中央對解放區出版的書報雜誌的大力調整和整頓，解放區文學社團出版的文學刊物大為縮減。到1942年初，在陝甘寧邊區的文學社團出版的文學雜誌僅剩下《文學月報》、《穀雨》和《草葉》等不多的幾種。緊接着，中共中央邀請一些黨外知識份子作家參加了由中宣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主持召開的解放區宣傳工作會議，徵求知識份子作家對解放區書報雜誌出版工作的意見^⑥。在綜合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中共中央於4月發布了〈關於統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由中央出版局和中宣部「按時決定編輯、出版、發行工作的一般方針與具體計劃」^⑦。解放區文學社團除了還可以編輯、出版那些還沒有停刊的文學雜誌外，不再擁有編輯、出版文學書籍的權利。當中宣部於1943年11月做出了〈關於

新華書店對已有的發行體制和機構設置進行了調整，形成了解放區書報刊物發行觀念的政治化。一旦解放區文學社團的出版活動被納入到新華書店的發行網絡中時，新華書店對其文學報刊和書籍整合就不可避免。

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後，在延安等地方機關部門工作的作家迅速做出了回應，紛紛要求到農村和部隊中去。「文藝下鄉」和「文藝入伍」的要求一方面使解放區文學社團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文學社團由知識份子的自由「集合」變成了文藝政策宣傳者的行政「組合」，另一方面使解放區作家再也無暇顧及文學雜誌的編輯、出版，延安僅存的《文學月報》、《穀雨》、《草葉》等雜誌相繼在1942年底停止出版。繼失去了編輯、出版文學書籍的自由權利後，文學社團也被迫放棄了對編輯、出版文學雜誌的控制。至此，由文學社團主導的社團化文學出版方式基本上退出了解放區書報雜誌的出版體系。

三 文學出版體制的建立

經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洗禮之後，解放區文學出版方式完成了根本性的轉變。從社團化到書店化，不僅是一種文學出版方式的轉化過程，而且也是一種文學出版規範的建構過程。解放區文學結束了不受任何規範的自由化出版時期，轉而進入了一個以思想控制和政治甄別為中心的規範化出版時期。當以審查制度為核心的文學出版規範形成時，解放區文學出版體制也就完全建立了。

從社團化到書店化，不僅是文學出版方式的轉化過程，也是文學出版規範的建構過程。解放區文學轉而進入了一個以思想控制和政治甄別為中心的規範化出版時期，以審查制度為核心的文學出版規範形成。

任何一個政黨在取得了國家政權以後都會建立自己的出版體制^②，中共領導的解放區也不例外。如前所述，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由於出版工作在政治宣傳中顯得日益重要，中共中央於1937年1月在延安設立了中央黨報委員會。這是中共中央在解放區最早開始設立的出版管理機構，專門負責《解放》周刊、《新中華報》、馬列著作和革命理論書籍的編輯、出版和發行工作^③。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共的抗日主張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了宣揚中共的抗日政策，「打破各地頑固份子對於本黨出版物的查禁與封鎖」，向各個解放區和國統區「散發、分配和推銷黨的各種出版物，統一對於各種發行機關的領導」^④，把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從「過去的文化落後區域變為文化中心」^⑤，中共中央於1939年2月決定「從中央起至縣委止一律設立出版發行部」。從此時起，中共不僅在各個解放區設立了不同層次的出版發行部，而且在各個出版發行部的領導下，建立了「公開的、半公開的或秘密的發行網」^⑥。延安整風運動前夕，為了「統一指導、計劃、組織全延安各系統一般編輯出版發行工作」，中共中央對中央出版發行部進行了精簡，成立了中央出版局，專門負責「決定編輯、出版、發行工作的一般方針與具體計劃，並保證其實現」^⑦。抗戰結束後，為了強化出版機構在政治宣傳中的意識形態功能，各個解放區成立的出版局又全部收歸各級宣傳部領導^⑧。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是，1948年1月晉察冀解放區成立了由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領導的邊區出版局，「掌握全區出版方針、計劃，領導編審、出版、發行工作」^⑨。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明確規定了不同類型的書報雜誌在編輯、出版過程中的編審領導機關，比如馬列著作的翻譯和出版由中宣部主管，軍事譯著的編輯和出版由中央軍委編譯局負責，大眾讀物和新文字書刊由新文字叢書工作委員會編審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以前一直沒有專門主管機關的文學書籍和文學雜誌的編輯和出版工作，由中宣部直接負責審查。這樣，解放區文學書籍和文學雜誌的編輯和出版終於被納入了中共的出版機構的管理之中。

與出版機構的設立相伴隨，中共根據解放區書報雜誌的編輯和出版需要，制訂了相應的出版規範，由各個解放區的出版機構負責執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前，中共制訂的主要是一般性的文化宣傳制度，沒有制訂單獨的出版規範，文學出版規範被納入文化宣傳制度之中，這就形成了文學出版的自由化特點。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確要求：「估計到中國文化運動（文藝運動在內）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級宣傳部必須經常注意對於文化運動的領導，積極參加各方面的文化運動，爭取對於各種文化團體機關的影響。」^②也就是說，中共對於解放區各種文化團體機關的文化活動只是作出「影響」，而不是全面「管制」，這與國民黨在國統區實行的「社團管制」、「出版審查」和「文藝禁錮」形成了明顯的對比^③。

中共關於文化活動的寬鬆政策使大批知識份子作家進入解放區，他們擁有「開展思想、言論以及文藝創作的自由」與「出版的自由」^④，掀起了解放區文學出版活動的高潮。面對解放區逐漸興盛起來的文化運動，中共中央於1940年9月公布的〈關於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規定：「各根據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不論是消滅文盲工作，學校教育工作，報紙刊物工作，文學藝術工作，除黨刊和黨報外，均應與一切不反共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及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聯合去做，而不應由共產黨員包辦。」^⑤毛澤東認為，應「允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教育家、文化人、記者、學者、技術家來根據地和我們合作，辦學、辦報、做事。每個根據地都要建立印刷廠，出版書報，組織發行和輸送的機關」^⑥。

正是這種對知識份子的開放的、自由的文化宣傳制度，吸引了大量的各種類型的知識份子參與到解放區的抗戰行列中來。在解放區，中共所制訂的文化宣傳制度一方面鼓勵和歡迎「不反共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及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事文化活動和文學出版工作，另一方面又進一步強化自身在文化活動和文學出版工作中的主導地位。1941年6月中宣部公布的〈關於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就提出：「辦報，辦刊物，出書籍應當成為黨的宣傳鼓動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務。除了中央機關報、機關雜誌及出版機關外，各地方黨應辦地方的出版機關、報紙、雜誌」，「凡關於國民教育、黨內教育、文化工作、群眾鼓動、對敵偽宣傳、出版發行、通訊廣播等工作均應受宣傳部的直接領導。」^⑦這顯示了中共在制訂解放區文化宣傳制度上的雙重性特點。

大量不同類型知識份子的到來，一方面帶來了解放區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編輯、出版的繁榮，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大多數報紙雜誌，顯示出分工不明，彼此重複，數量多而品質差，形式鋪張而內容貧乏的嚴重弱點」，而且報紙雜誌的「編輯、出版、發行的制度也尚不完善」。於是，中宣部於1941年7月專門制訂了針對「各抗日根據地報紙雜誌」的指示。這是中共在解放區公布的第一個獨立的報紙雜誌出版規範，該指示不但明確規定了不同報紙雜誌的出版機關，而且提出公開發行的報紙雜誌「都必須建立編輯委員會，揀選政治上得力的幹部來負責」。而「作為各種學術研究與文藝活動的理論和實踐的指導刊物，及文藝作家發表作品的園地」的「文化文藝性質的雜誌」，必須在中共的指導下編輯和出版^⑧。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中宣部於1942年12月又一次向各個解放區發布了〈對各地出版報紙刊物的指示〉，明確了不同出版機構編輯、審查和出版報紙雜誌的權限^⑨。

中共所制訂的文化宣傳制度一方面鼓勵和歡迎「不反共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及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事文化活動和文學出版工作，另一方面又進一步強化自身在文化活動和文學出版工作中的主導地位。

解放區文學出版規範中的審查制度主要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後形成的。解放區公布的書籍出版方面的規範都強調中共對文學出版活動的領導。審查制度對作家創作中的政治傾向有意甄別，對文學作品中的思想意識嚴格控制。

在解放區文學出版體制的規範化建構過程中，晉察冀解放區的出版規範值得重視。隨着晉察冀解放區地域的擴大和書報雜誌出版活動的興盛，1948年1月，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公布了《晉察冀邊區統一出版條例》。這是在中宣部以外的其他解放區中央局宣傳部制訂的第一個出版條例，該條例共八條，規定了晉察冀解放區書籍期刊出版的領導機關、編審制度、發行機構、書店登記辦法等內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該條例明確規定：「凡資本主義國家（英美等）及蔣佔區之圖書，及未經中央局出版批准之所有圖書，均不准翻印出版或公開發行。」^④這說明，政治意識形態在解放區文學出版規範的制訂中佔據了主導作用。《晉察冀邊區統一出版條例》的公布開創了解放區文學出版體制建構的先河，它成為1949年後新中國文學出版規範建構的基礎。

面對中共管轄區域向全國範圍的擴大，中宣部於1948年6月公布了面向所有解放區的書籍雜誌出版的「請示與報告制度的決定」，進一步規範了黨內書籍雜誌出版的審查制度、黨外書籍雜誌出版的報告制度、群眾文藝宣傳活動的登記制度等。接着，中共西北、東北、華東、中原等中央局宣傳部依據中宣部的決定，相繼制訂了涉及文學出版和文藝演出的規定。這些規定有的要求「各地書店、圖書館、民教館的書籍、雜誌、報紙，凡係蔣管區出版者，須經地委或縣委宣傳部門的審查，始得出版或陳列」^⑤，有的要求「新編的戲劇，應先彩排，由地委以上宣傳部或旅以上政治部審查，認為與批准之劇本精神相符合，始准公演」^⑥。雖然這些規定並不以「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出版規範」的名稱直接命名，但都是以書籍報刊的編輯、出版和發行為主要內容的。至此，遍及全部解放區的文學出版體制完全建立起來了。

審查制度是文學出版規範的核心，也是文學出版體制建構中規範作家創作活動的主體因素，解放區文學出版規範也同樣注重對審查制度的設立。解放區文學出版規範中的審查制度主要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後形成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前，中共在解放區公布的書籍出版方面的規範都強調中共對文學出版活動的領導。例如前述的〈關於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中共和「各級宣傳部必須經常注意對於文化運動的領導」^⑦，〈關於各抗日根據地報紙雜誌的指示〉規定「報紙雜誌的領導應統一於黨的宣傳部」^⑧等都是如此。但是，解放區文學創作和文學出版活動開始慢慢發生着變化。

由於知識份子作家思想中存在的所謂「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嚴重地阻礙着解放區文學的發展^⑨，於是，中共中央於1942年12月提出「宣傳部應經常檢查報紙雜誌的出版工作，下級的報紙雜誌應送上級宣傳部審查，黨的委員會及主要負責人應定期的直接檢查宣傳部此項工作」^⑩。此後，中共在解放區公布的每一個涉及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的編輯、出版規範都有審查制度方面的條款。關於解放區文學出版規範中的審查制度，最為完備的是《晉察冀邊區統一出版條例》^⑪。

文學出版規範中的多層次審查制度，不僅是對作家創作中的政治傾向的有意甄別，而且也是對文學作品中的思想意識的嚴格控制，極大地規範了文學作品的創作、出版和發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曲折出版歷程就印證了解放區文學出版規範中的審查制度對作家創作的影響。

1947年8月，丁玲將歷時一年半才完成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初稿謄抄給時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長兼出版局長的周揚，但是一直沒有回音。後來，丁玲聽到『一位黨政要人』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對反映土改的作品的指責^④，於是從1948年4月開始重新修改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然而，當丁玲拿着修改好的小說要求出版時，周揚卻認為作品存在着「原則問題」，對丁玲「突擊完成」的作品「不置一詞」，似乎「有意地表示着冷淡」。丁玲不得已於6月中旬向毛澤東談了自己近期的小說創作情況，毛澤東表示「願意讀」丁玲的作品，似乎肯定了丁玲的創作^⑤。丁玲隨即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手稿交給了時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胡喬木。丁玲在日記中寫道：「喬木問我有何希望，我說請看看，如果在政策上沒有問題，有可取之處，願出版。他說不一定看，出版好了。我說還是看看好。他說也不可太嚴。他承認有偏的情況，他覺得文藝還是稍微自由的好。」此後，艾思奇、蕭三等人相繼審閱了小說，但結果卻是建議她「俟後出版」^⑥。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出版問題一直拖到7月底，毛澤東一次約請胡喬木、艾思奇、蕭三等人到野外散步時，胡喬木才藉機向毛澤東談到了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由於毛澤東的「默許」，《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才被認為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現了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書，建議有關方面早日出版」^⑦。儘管胡喬木認為「文藝還是稍微自由的好」，然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還是在經歷了從主管文學出版的負責人到中共的最高領導人的政治審查之後，才於1948年9月得以出版。正是在對不同文學作品的嚴格審查中，解放區文學的出版體制逐漸建立起來了。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經歷了從主管文學出版的負責人到中共的最高領導人的政治審查之後，才得以出版。正是在對不同文學作品的嚴格審查中，解放區文學的出版體制逐漸建立起來了。

註釋

- ① 何其芳：〈一個平常的故事〉，載《何其芳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223。
- ② 何其芳：〈我歌唱延安〉，載藍棣之主編：《何其芳全集》，第二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頁41。
- ③ 中國文藝協會的發起人共34人，除丁玲、成仿吾等少數作家外，其餘大多為中共的領導人或中共其他部門的負責人。
- ④⑤ 引自鍾敬之主編：《延安文藝叢書·文藝史料卷》（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頁303；361。
- ⑥ 毛澤東主席講演略詞，〈紅色中華·紅中副刊〉，第1期，1936年11月30日，頁4。
- ⑥⑥ 丁玲：〈西北戰地服務團成立之前〉，載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五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頁47；48。
- ⑦ 丁玲：〈政治上的準備〉，載《丁玲全集》，第五卷，頁47。
- ⑧ 林茫：〈我們的「文聯」成立了〉，《新中華報·動員》，第9期，1938年9月20日，頁4。
- ⑩⑪⑫ 中共中央：〈關於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上編（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頁91。
- ⑬ 文抗分會籌備改選，〈解放日報〉，1941年6月19日。
- ⑭ 歡迎科學藝術人才，〈解放日報〉社論，1941年6月10日。
- ⑮ 洛甫：〈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解放》，1940年第8卷第103期，頁14。
- ⑯ 趙生明：《新華書店誕生在延安》（西安：華岳文藝出版社，1989），頁32。

- ⑯⑰⑱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發行部的通知〉，載《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上編，頁88；88；89。
- ⑲ 錢藩主編：《中原—中南新華書店史：1948-1954》（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頁27。
- ⑳ 姚文錦主編：《晉綏邊區出版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109。
- ㉑ 〈新詩歌編後〉，《新詩歌》（綏德版），1942年第6期，頁18。
- ㉒ 中共中央：〈關於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載《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上編，頁98。
- ㉓⑳㉔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各抗日根據地報紙雜誌的指示〉，載《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上編，頁115；116；116、117。
- ㉕ 根據蕭軍日記的記載，他本人參加了1942年2月8日舉行的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參見蕭軍：《人與人間：蕭軍回憶錄》（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頁362。
- ㉖⑳ 中共中央：〈關於統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載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8），頁367。
- ㉗ 沈固朝：《歐洲書報檢查制度的興衰》（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3。
- ㉘ 常紫鐘、林理明主編：《延安時代新文化出版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6。
- ㉙ 毛澤東：〈論持久戰〉，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473。
- ㉚ 中共中央出版局於1946年1月撤銷，併入中共中央宣傳部，其他解放區有的撤銷了出版局，併入了宣傳部，有的重新成立了出版局，但是歸宣傳部直接領導。參見《延安時代新文化出版史》，頁21。
- ㉛ 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關於成立邊區出版局的決定〉，《晉察冀日報》，1948年2月2日。
- ㉜ 江沛、紀亞光：《毀滅的種子——國民政府時期意識形態管理研究》（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頁86、186。
- ㉝ 艾思奇：〈當前文化運動的任務〉，《中國文化》，1940年第1卷第6期，頁20。
- ㉞ 中共中央：〈關於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199。
- ㉟ 毛澤東：〈論政策〉，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768。
- ㊱ 中央宣傳部：〈關於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載《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上編，頁110、111。
- ㊲⑳ 中共中央宣傳部：〈對各地出版報紙刊物的指示〉，載《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上編，頁168；169。
- ㊳⑳ 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晉察冀邊區統一出版條例〉，《人民日報》，1948年1月21日。
- ㊴ 中共西北中央局宣傳部：〈關於宣傳制度的規定〉，載《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上編，頁197。
- ㊵ 中共華東中央局宣傳部：〈關於統一黨的宣傳工作的指示〉，載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編：《中共山東宣傳史料·宣傳工作文件選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頁241。
- ㊶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放日報》，1943年10月19日。
- ㊷⑳ 引自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頁193；195。
- ㊸ 甘露：〈毛主席和丁玲的二三事——悼丁玲同志〉，《新文學史料》，1986年第4期，頁88。
- ㊹ 丁玲：〈從正定到哈爾濱〉，載《丁玲全集》，第十一卷，頁339、343。